

# 山西省沁县南涅水石刻馆

□ 曹雪霞

南涅水石刻馆坐落在山西沁县县城西南的二郎山上,因此该馆又名二郎山石刻馆。石刻馆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千平方米,陈列面积3千平方米,其建筑风格为仿明、清式建筑。馆内陈列着由1957年到1959年相继从县城东北的南涅水村出土的石刻造像1100余件。石刻造像挖掘后,先是堆放于出土地附近的洪教院正殿内,1962年将全部石刻运回县城陈列馆内。1965年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国家先后拨款300万元,在沁县城南西湖河畔的二郎山巅修建石刻馆,1989年国庆四十周年之际石刻馆正式对外开放(图一)。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佛教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为南涅水石刻馆题写馆名“南涅水石刻馆”(图二)。2011年7月石刻馆闭馆维护装修,同年10月重新开放。

据碑文记载,这批石刻造像雕刻年代为北魏太和年间至北宋天圣九年(公元477年-公元1031年),相继延续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宋六个朝代约500余年。南涅水石雕艺术珍品题材大多以佛教活动为主,分为单体造像、造像石塔、造像碑铭三大类型。其中以造像塔为主,约400余件,分别叠垒成五节或七节不等的石塔,塔四

面开凿佛龕,龕内雕刻多以佛教人物及佛传故事为主,龕周多饰鸟兽、花卉及以佛事为内容的各种图案。内容丰富多彩,龕饰繁缛富丽,造型生动,为全国罕见。单体造像近300尊,最大的2.65米,最小的仅十几厘米,多为佛、菩萨、罗汉,或坐或立,体态各异。有的神态自若,肃穆庄重,有的婀娜多姿,楚楚动人,有的怒目锁眉,威严冷峻。尊尊造像雕刻生动,表现自如,展示了不同时代的造像风格。造像碑、铭文碑共计50余通,大部分均有历史纪年题记,可对全部石刻的分期断代以及其他研究起佐证作用。

这批石刻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是古代民间佛教雕刻艺术的集中反映。由于其形制独特,内容广泛,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艺术风格,受到历史、考古、美术、佛教等各界专家学者的重视。石刻中表现出来的内容为研究历史、社会、佛教以及美术、雕刻、建筑、书法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是一批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

南涅水石刻是佛教在这一地区发展、演进的具体表现和民间石雕艺术的集中展示。在出土的上千件各种类型的石雕造像中,有文字题记的50多件,其中有雕凿纪年的40余件。由于出土



图一 南涅水石刻馆全景



图二 南涅水石刻馆(馆名由赵朴初先生题写)

的石刻数量多、历史跨度大、埋藏时间长、残损严重等原因,从而使原始造像的主从关系和组合配置关系难以考证。有关这批石刻的情况,史书无任何记载。又因为这些石刻属民间作品,在产生之初就有很大的自由度和创作空间以及其浓厚的地方特色,使得今人更难于借鉴和比对其他地区的同类造像。因此,这些文字资料的发现,特别是有文字铭记的各种类别的石刻就更显示出它们的珍贵。它们在石刻中具备了标准器的作用,是石刻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

南涅水石刻虽然与云冈、敦煌、龙门石刻风格类同,但更以其精巧玲珑著称于世:简洁夸张的刀法,形象地刻划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奇巧纷呈的构图,逼真地烘托了众多佛传故事。佛教自

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无论佛像,还是罗汉、供养人乃至飞天的形象,都从印度风、中亚风而转为中国风,并进而从西域渐变为中原型,其画面上的建筑、陈设、服饰、装饰纹样等都明显地显示出中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南北朝、隋唐是我国佛教造像发展的高峰期,由于当时统治者佞佛的影响,不论是上层社会的地主阶级还是贫民百姓,莫不崇佛信佛,塑像建寺。而南涅水正是北魏都城洛阳到陪都平城(大同)的必经之路,受其地理位置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石刻造像既呈现出时代的共性和地方特色,也显示出继承和发展的脉络,若将南涅水石刻与附近各大型石窟比较,从造像题材、技法上可以明显看出,官式和民间两种形式并存,有的构图正规,技法娴熟,表情生动自然,耐人寻味;有的技法比较粗糙,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大批石刻造像的出现,反映了人民敬佛礼佛的虔诚和永远追求不到的幻想。南涅水石刻质地精细,造型优美奇特,内容丰富多彩,一幅幅画面故事生动感人,为我们今天研究佛教、美术、雕塑、建筑、书法等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是我国难得的珍贵文化遗产。自出土以来,受到各级领导及相关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

南涅水出土的单体造像有两类。其一是仅雕



图三 单体造像



图四 单体造像



图五 造像塔

刻某一名佛教人物的,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或金刚力士像等,姿势有立式、坐式、交脚式等多种(图三)。这些雕像造型各异,质感强烈,形态有的丰满圆润,有的清秀俊丽,有的清俊中透出丰腴,反映出不同雕像各个时代的外部特征和内心世界。其二是以一石为材,作整体构思,上部雕刻人物形象,如佛、菩萨作为主尊造像,两侧左右对称配胁侍佛、菩萨像或弟子像,后部雕刻装饰性图案,如身光、背光、火焰纹。下刻像座,像座上雕刻博山炉、莲花、化生佛、托座力士、护法金刚、护法兽、供养人等形象,又有铭文阴刻于座下或背面,述供养人、光明主等造像的缘由、时间、心愿等(图四)。这种形式的石刻为某种组合群体,融佛界于一石之上,有依山开凿之意,似为摩崖开窟造像缩影。

塔,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梵文“Stupa”的译音,以藏舍利和经卷之用,而造像塔系借助塔形造像的佛教艺术形式,是继北朝凿山石壁开窟造像以后在民间兴起的一种新的佛教雕刻形式。在南涅水出土的石刻中,数量最多的是石塔的塔体,现存近400件。它以方石为料凿成四方形柱体,内有雕像,龕外刻装饰性图案或故事画面,构图严谨,意趣浓厚,底层边长约70厘米见方,自下而上逐渐递缩,是上小下大的梯形状态,顶部石块边长约20厘米。每组5~7块组成,高达3米左右,是多种塔与柱的综合体,既为塔又为柱。这些造像塔多为7层,每层可以分离,可以组合,可移动,可变向,这是南涅水石刻的一大特点(图五)。

石塔的塔体有三种形状:一是四方柱形的塔体,塔体上下尺寸相同,没有收分,相邻的四面尺寸相近。二是四方锥形塔体,塔体下大上小,有较大的收缩,相邻四面形状相同,每块塔体都像是一节平切的方形锥台。三是近似圆柱形的八角形塔体,各面开龕造像,面与面之间明柱斗拱相连,浑然一体。南涅水出土石刻中这一类型的石塔塔体仅存三节。将其按下大上小,两节之间以塔檐相衬,上安装塔刹,叠成一座八角形的石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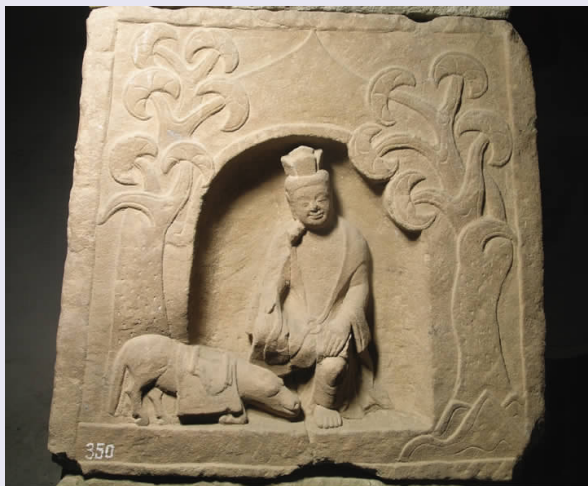
造像塔石四面开龕,都迭垒成塔形,每块石刻周围都雕有佛龕,龕内有佛像。主要雕刻有圆柱体、火焰纹、佛、弟子、菩萨,有单佛独坐莲台,也有二佛并坐,还有诸多刻划佛传故事的画面。这些佛像或赤足站立于莲台上,或结跏趺坐于莲台,或正立正坐,或侧身站立,或讲经说法,或静目深思,尊尊雕像体态端庄,神姿安详。佛龕用龙首和各种花卉图案装饰,图案奇出多变,同是用龙首供装饰的,龙首气势却变化多端,有的垂首汲取,有的昂首欲飞,有的逍遥平视,有的怒欲吞云,有的嬉戏吐雾,有的口衔佩玉垂。构图内容丰富,形象逼真,繁缛华丽。

南涅水石刻造像塔的另一特点是佛龕式样丰富多彩,种类多达十几种,有尖眉龕、屋形龕、麈形龕、圆拱龕、楣拱龕、树形龕等。龕额分别雕刻飞天和象征日月的金翅鸟和蟾蜍。龕的两侧多为菩萨、金刚、弟子等。下面有博山炉、供养人、地鬼等。有些龕的雕刻以平面和复线处理,不加修饰,取诸法之长,视需要而灵活运用,手法简洁多样,造型和线条力求简练甚至舍其形而求其意。表现了工匠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



图六 八面体造像





图七 白马吻足

在南涅水石刻造像发展到高峰时出现了八面体造像(图六),现仅存四例。仿木结构龕形,以柱形分隔,一斗三升人字拱,八面各开圆拱尖楣龕,诸龕题材有禅定印佛,施无畏与愿印佛,思维菩萨及阿育王施土缘故事。座式有莲花座、象座和双狮座,这是一种罕见的八面体多极组合式造像塔。

南涅水石刻中雕凿的故事性题材有很多。比如佛本生故事,佛本行故事和因缘故事。白马吻足图,这是佛祖释迦牟尼出家时与他的白马告别的场面,在众多佛教石刻中极富寓意,是把释迦牟尼由白象转世投胎的故事与菩提树下辞别白马的故事组合在一起,赞扬了他为拯救受生老病死折磨的众生而放弃名利、富贵,追求自由、幸福,普度众生的过程。南涅水石刻的这个龕中的马的前腿下跪,正在用舌头舔舐佛祖的脚,表现出马与主人依依不舍的情景,十分感人(图七)。龕的周围饰以山、树等物,似乎在暗示佛祖即将出家并进山修行。

“文殊问疾图”龕中中间人物是佛祖,右边是双膝跪地的文殊菩萨,维摩诘坐在榻上,尖颌长脸,头顶毡帽,一派西域人风貌。刻画中的文殊菩萨十分虔诚,合拢双手提着鱼看望生病的维摩,似乎正反映了古时南涅水地区看望病人时的情景(图八)。这一表现形式说明了佛教与当地习俗的结合,而这也正反映了南涅水石刻独一无二的民间特色。

百戏:杂耍在我国的汉代画像砖上已有详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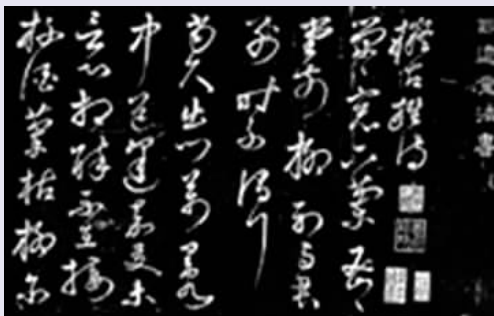


图八 文殊问疾

的描述,云冈石窟和其他一些石窟壁画都有所表现。南涅水造像石塔塔体有两件表现了北魏时的百戏图,技法包括爬杆、顶杆、倒挂、倒幢、软功、空翻,还有抛流星、踩高跷、抖空竹等多种高难度动作。表演时还有乐器伴奏,将杂技表演的场景刻画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图九)。所有这一切均刻在龕外四周,因为面积狭小而仅求其整体效果使具象与意象融合,展示了当时民间生活的一个侧面,说明百戏杂技在南北朝时已经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



图九 百戏图



图一〇 千字文

石刻馆在收藏南涅水石刻的同时,还珍藏着东晋学者陶渊明手书“拟古杂诗”十二首玉石石刻。清乾隆六年,沁州人张孝捏任监察御史巡视江南时,欣得陶渊明亲笔撰写的《拟古杂诗》12首,遍访名工以“致远堂法书”为题镌刻于玉石之上。后广为拓印,远销英、美、法等国。另两块是阅者的题跋,有沈约、狄仁杰的题字。尤为吸引人的是武则天的题词共82字,一气呵成,还加盖了她“凤阁之宝”、“凤阁审定真迹”印玺,还有名士常熟人钱谦益观后加盖的“虞山老椎”印章。

石刻馆中还陈列着康熙御书石刻。清康熙四十二年前后,康熙帝把自己临摹的宋朝书法家米

芾的《千字文》,连同他本人撰写的前言等,赐予了当时的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吴琬。吴亲自选购汉白玉,访名工将其镌刻后珍藏。吴去世后其子吴时谦在沁县城吴氏祠堂后建“宸翰楼”一座,将全部石刻嵌在楼内墙壁上,后来又改名为御书楼。石刻馆中院大殿陈列的是从御书楼的墙壁上拓下来的拓片。康熙皇帝的手书碑刻48通,每通高35厘米,宽100厘米,大小均等。共存有康熙皇帝字迹1246个,笔势深得米芾“风墙阵马,沉着痛快”的书法真传(图一〇)。这些题刻使用了五方特备印章,其间分别附有康熙的自用“康熙宸翰”、“敕几清晏”、“稽古右文”、“龙天主人”和“康熙御笔之宝”等五方特备印章。字数之多,为全国所罕见。

总之,沁县南涅水石刻馆馆藏丰富,文物价值颇高,在开馆二十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佛教信徒,不远千里前来欣赏。石刻馆以它独有的魅力,展现于世人面前。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沁县文物馆)

(上接14页)

[5] 郭凯旋《铜和铜合金牌号与金相图谱速用速查及金相技术创新应用指导手册》,北京:中国知识出版社,2005年,913页。

[6] 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282页。

[7] 共统计了175件铜器数据,数据详见:赵国华等《天马曲村遗址青铜器样品检测报告》,《天马·曲村(1980-1988)》附录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172-1173页;刘煜等《天马·曲村周代晋国墓地出土青铜器锈蚀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第2期,9-17页;杨颖亮《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显微结构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北京大学,2005年,20-22页。

[8] 共统计了26件铜器数据,数据详见:杨军昌《陕西关中地区先周和西周早期铜器的技术分析与比较研究》,北京科技大学,2002年,160-161页。

[9] 共统计了136件铜器数据,数据详见:苏荣誉等《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和金属器物检测》,《宝鸡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630-636页。

[10] 数据详见:海金乐等《灵石旌介商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209-228页;韩炳华等《山西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的科学分析》,《考古》2009年第7期,80-88页;柴建国《崔家河墓地出土青铜分析》,山西大学,2007年,26-27页。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